

Yi Lu Xiang Xi

一路向西

黄茵 著

早安，藏北；早安，拉萨
早安，格尔木；早安，阿里
早安，梅里；早安，阿里
要我多少次回眸，
才能化作你的传奇



嶺南美術出版社

内容简介

1989年，杂志编辑黄茵跟随货车车队穿越青藏公路，去拉萨看望援藏的朋友；1992年，黄茵搭乘飞机赴拉萨的朋友之约，抵步不久，她又搭上了顺风车，穿越中尼边境；2005年，已经成为自由摄影师及作家的黄茵，再次远赴南疆，跟随朋友来回新藏线，漫游阿里地区。17年里，黄茵三次从不同的线路入藏，拍下大量珍贵图片，她又以详尽的日记、诗意的短句，叙述了她亲历亲闻的西藏故事。

本书得到黄茵的挚友陈真、张惋惋、耿毅军的鼎力相助，他们在百忙之中欣然命笔，为黄茵及读者们写下他们心中的西藏之情。

Yi Lu Xiang Xi

一路向西



黄茵 著



嶺南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路向西 / 黄茵著.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362-3561-5

I. 一… II. 黄…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
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9123号

责任编辑: 左 丽
责任技编: 钟智燕
责任校对: 虞向华

一路向西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 510045)

出 版 人: 徐南铁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40
印 张: 7
印 数: 1-3000册

ISBN 7-5362-3561-5

定 价: 34.00元

CONTENTS | 目 录

代序：缘结西藏	4
1989，西行漫记	15
附录1：耿毅军进藏手记	54
1992，早安，拉萨	69
附录2：我们的西部	136
2005，左右西游记	161
后记	276



代序：缘结西藏

文：陈真

今天的人，都爱讲个缘字。在很早的汉字中，“缘”事实上有边缘的意思；但自从佛教东进，带有宗教意味的“缘”就超出了这个“边缘”的原解，人们把自己与世界万物发生的特殊联系说成是“结缘”，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黄茵说，她和我的结识，和西藏有关。这本书中，黄茵讲了她和西藏结缘的故事，也讲了因西藏她和许多人结缘的故事。

我在哪里第一次见黄茵记不起来了，肯定不在西藏。1987年春节，家在广州的同事兼好友李缨约我和子扬老兄去广州过春节，黄茵经常和我们一起吃饭、出游。黄茵长相和举止极娴静，话不多，是个合格的倾听者；李缨，尤其是子扬都极能说。李缨和子扬刚从西藏回来，大家在一起聊着聊着总要转到西藏的话题。子扬老兄动不动把西藏带回来的孔雀毛或者偷个盘子画上谁也不认识的藏文当礼物送人，他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几岁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好胜、好奇、爱冒险。1985年李缨第一次进藏，因病住院，由于使用了不洁的输液针管，在医院里面抽搐了一宿，幸被及时发现，经抢救而无恙。回北京后，兴奋的他又发生了许多

1987春，小梅沙。前左起张子扬、黄茵、陈真，后排李缨、黄小燕。



奇特的事。时隔一年，他又一次进藏，拍摄雪顿节，子扬与他同行，这是李缨第一次独立担当导演。从西藏带回来的除了片子的素材，就是几大箱来自西藏的奇特的玩意儿，像藏刀、羊头、牛头等等。这些东西放在屋里，散发着变质的酥油味。他闻着这个味道，感觉自己人还在西藏，我在这种味道中开始向往那个地方。

1988年初，我所在的部门组织摄影队赴西藏拍摄藏历新年与拉萨大祈祷法会，李缨担任导演。刚从日本回来处于半休假状态的我，得知原定的几位摄制组成员托故不去，于是自告奋勇、没名没分地就跟着李缨去了。吸引我的只有两个字：西藏。藏历新年如同内地的春节，时间上有时候差一两天，有时候差一个月，1988年那年，就和农历春节差一天。高原缺氧，冬天就更缺氧，条件自然艰苦。

摄影队由我所在的电视台和中国新闻社的人员组成，一共12人，领队是位女士。李缨和我打前站，比大部队早去一周。在成都双流机场转机时，只听到有个浑厚的男中音叫了我一声，他说你认不出我了吧。我极力想回忆起来此人我在哪儿见过，但就是想不起来。见我神情窘迫，他笑着说，我是张忠。张忠！那是我班最小的同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去支援西藏。记得在大学的时候，他是一张娃娃脸，可现在却是人高马大，胡子拉碴，身边还有娇美女子相随。毕业才三年，相见不相认，当时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直到今天张忠还逢人便说我们的这段窘遇，令我羞愧难当。上了飞机后，又认识了一大堆人，其中有新影的两位年轻的藏族摄影师，扎西旺嘉和多吉，他们也是去拍藏历新年和大祈祷法会的，他们这次的导演是我的大学同学傅红星。飞机入座以后，坐在前排的一位长相俊朗的年轻人跟我们攀谈起来，就这样我们认识了时任西藏宣传部副部长的朱晓明和他的妻子卢晓飞。朱晓明是中国著名的电影摄影家朱今明的公子，后来长期担任负责民族宗教事务的统战部某局局长。卢晓飞当时是《人民日报》驻拉萨记者站的站长。也因为朱晓明、卢晓飞夫妇，我后来结识了我的校友、负责西藏宣传的丹增书记。

为了报道藏历新年和大祈祷法会，北京来了很多记者。李缨和我到拉萨一周后，我们的大队人马在女领队的带领下，浩浩荡荡来了。他们说，傅红星带着中央新影

的人马同机到达，飞机上还有自费来的子扬老兄。

藏历新年人们知道得比较多，大祈祷法会知道的人不多，这里多说几句。西藏崇佛，有许多宗派，现在影响最大的是格鲁派，俗称“黄教”，班禅、达赖就属此派。格鲁派由宗喀巴创建，他是14世纪西藏最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为了弘法，也为了扩大格鲁派的影响，宗喀巴于1409年在拉萨举办了大祈祷法会，藏语“莫朗钦默”，汉族称“传大昭”。历史上认为，拉萨大祈祷法会的举办标志着格鲁派地位的正式确立。自此以后，每当藏历新年期间，拉萨三大寺的僧众云集市中心历史最悠久的大昭寺，每天诵经礼佛，并接受信众的进香布施，法会期间还要举行佛教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的考试。由于种种原因，传统的祈祷法会停办多年，1988年是恢复后的第一次。这本是西藏僧俗两界极为欢庆的大事，但由于境外藏独势力活动猖獗，这次大祈祷法会一直笼罩在骚乱的阴影之中。我们到达拉萨后不久就听说当时的广播电台记者刘伟被坏分子打成重伤，在医院奄奄一息。因为我们人多，目标比较大，加上领队又是一位女士，安全是个大问题。因此，除了工作，很少自由活动。当时我们住在拉萨饭店，距布达拉宫走路也就十几分钟，吃饭在离布达拉宫不远的北京路上四川人开的小饭馆包伙，还在布达拉宫山脚雪村拍摄一户藏族人家过新年的全过程；每天仰望最著名的布达拉宫却没有进去过。繁重的工作、糟糕的伙食，我终于病倒了，到西藏军区总医院住院。李缨看我躺在病床上，身上插了三四根管子，当场掉了泪。

工作虽然累，进展却很顺利。转眼到了3月5日，这是法会的最后一天，将举行迎请强巴佛（未来佛）仪式。僧人将强巴佛放置在一辆大卡车上，缓慢绕八廓街一周，接受僧众的顶礼膜拜。当强巴佛行进到松觉热广场时，一些人开始围攻当地官员，并形成了游行队伍。当时我带着摄像机正在大昭寺正门口支着机器，等待拍摄强巴佛回寺的场面，只听得阵阵尖叫，刚把镜头转向迎面走过来的人群，却迎来了如弹雨般的石块。记得自治区领导曾经说过，一旦发生情况，就进入大昭寺西南角的传昭办公室，那里有中央和自治区的领导，有武警战士保卫，比较安全。

当我们收拾机器往传昭办公室跑的时候，我亲眼见到一块巨石从三楼扔下，在地上弹起半人多高。我们跑到三楼的传昭办公室时，发现不大的屋子已聚集了有五六十人。我和摄像杜信及他的两个助手气喘吁吁，惊魂未定，不过毫发未损，摄像设备也完好。就在我们庆幸之时，号称最安全的传昭办公室，被闹事人包围了，而大昭寺内除了传昭办公室，基本上是闹事人的天下。闹事人开始砸门，想冲进办公室，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去顶门，我也去了。那门事实上已经开了，所幸门板极厚，众人用大沙发和桌子把门堵了个严严实实。闹事的人环绕八廓街游行，经过传昭办公室时就向上狂扔石块，传昭办公室沿街的玻璃几乎都给砸碎了，这样的情形持续了有将近一个小时，电视记者除了我们四个人以外，还有西藏台的六个小伙子，六个人中间有一个长得矮矮墩墩、眼睛细小的小伙子，外号叫“王爷”，但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十几年后他也参加了《布达拉宫》的拍摄。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是大胡子子扬，他是以个人身份来到西藏，只见他猫着腰趴在窗口拍照片，闹事的人扔石块时，他就像弹簧一样蹦得老高，在石头和玻璃碎片的飞雨中，他安然无恙，令人称奇。后来当我们回到北京受到表扬的时候，他因没有请假去西藏，反过来受到了所在部门的严厉批评，此乃后话。

由于情形危急，武警战士们前来营救，但考虑民族政策，不能使用热兵器。只见他们举着木棍，带着头盔，向我们传昭办公室包围了过来，在屋顶上闹事的人，把石块像雨点般地向他们扔去，很多战士当场受伤倒地。最后武警战士向大昭寺楼顶发射了催泪弹，驱散了扔石块的人，来到了传昭办公室的楼下。因为闹事者仍在撞击传昭办公室大门，所有人员只能用战士们扔上来的背包带，从大昭寺三楼顺索而下。人们让年纪大的和女同志先下，由于我是从北京来的，也让我比较早地下来了。记得当时听到西藏台六位小伙高声叫：“西藏台的人最后下。”听到此言，我眼眶一热。当我们进入安全地带以后，看见武警战士已经攻入了大昭寺，事态渐渐平息。这就是著名的拉萨“3·5”骚乱，我算是一个亲历者。

那天也是我第一次闻到了催泪弹的味道，影响了胃口，吃不下饭，心情也极

为复杂。作为一个内心向往西藏的我，见到与我常在梦中所萦绕的那种平和、高远的雪域风情大相径庭的场景，心情当然极差，但这血腥的一幕是那么的真实。在随后的十来天里，我们驱车去了泽当、日喀则等地，翻过了唐古拉山口，在一个极其缺氧和寒冷的兵站，度过了难忘的一夜，最后到达中尼边境的樟木口岸。一路上所到之处，发现那里的人们丝毫没有受到拉萨骚乱的影响。美景当前，但我却无心陶醉，那一路看到了什么，我今天几乎记不起来。

回到北京后，作为导演的李缨，因为办理出国手续，离开北京长住广州，片子的编辑工作交给了我这个临时去的人。由于我在西藏的英勇表现，还在全台大会上做了报告，并给予了300块钱的物质奖励。作为领队的那位女士，因为刚结婚，还分得了一套住房。台领导说，如果你结婚了，也会给你一套。可我当时既没结婚，更没有女朋友。新影厂的导演、我的同学傅红星，因为没有受到任何表彰，心情也十分失落了一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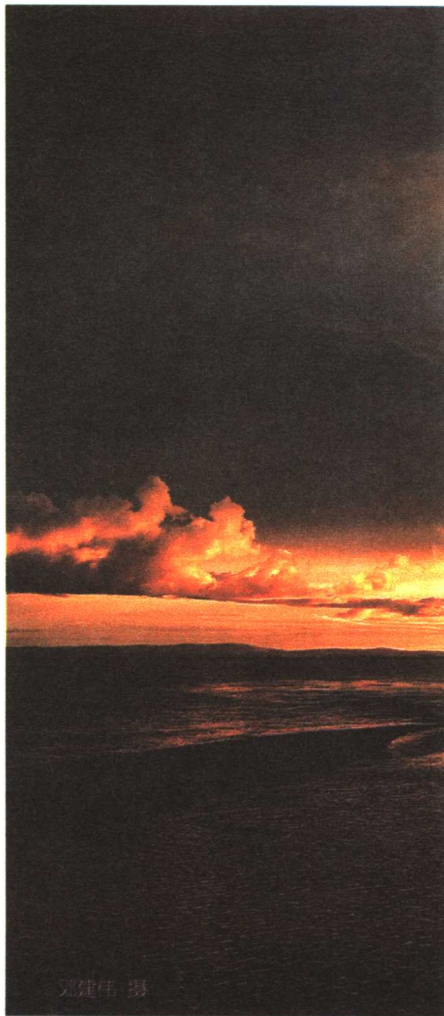
由于在西藏经历了一番生死考验，我突然想，必须要考虑自己的人生大事了。也就在那一年的年底，我结识了一位女同行，两个月以后，就和她结了婚。婚后一年，妻子出国留学，再一年，我也随之而去；在国外艰难度日，在生下一个孩子后，家庭解散，重回北京，报效祖国。

出国前，我曾经认为自己不会再从事影视工作，但回国后，因身无旁技，不得已重操旧业。回北京后的我，曾和当年一起在西藏的傅红星，合住在八宝山区一个公寓里，从头来过，其中艰辛只有自知。幸得很多朋友的鼓励和帮助，黄茵也曾来八宝山看望我们。黄茵和傅红星也是老相识，黄茵曾在她的文章中说，他们的结识是因为在西藏有共同的朋友。后来，我在影视制作中谋得许多机会，其中之一就是1998年我参与了电影纪录片《布达拉宫》的拍摄，立项时为了寻找帮助和政策支持，我去了统战部，接待我的居然就是负责西藏事务的朱晓明局长。见面后，该谈的工作话题都让位给了叙旧。朱晓明已经由当年的帅小伙变成了两鬓斑白的中年人。我们俩拍指一算，整整十年，齐声感叹，又因为西藏而再次结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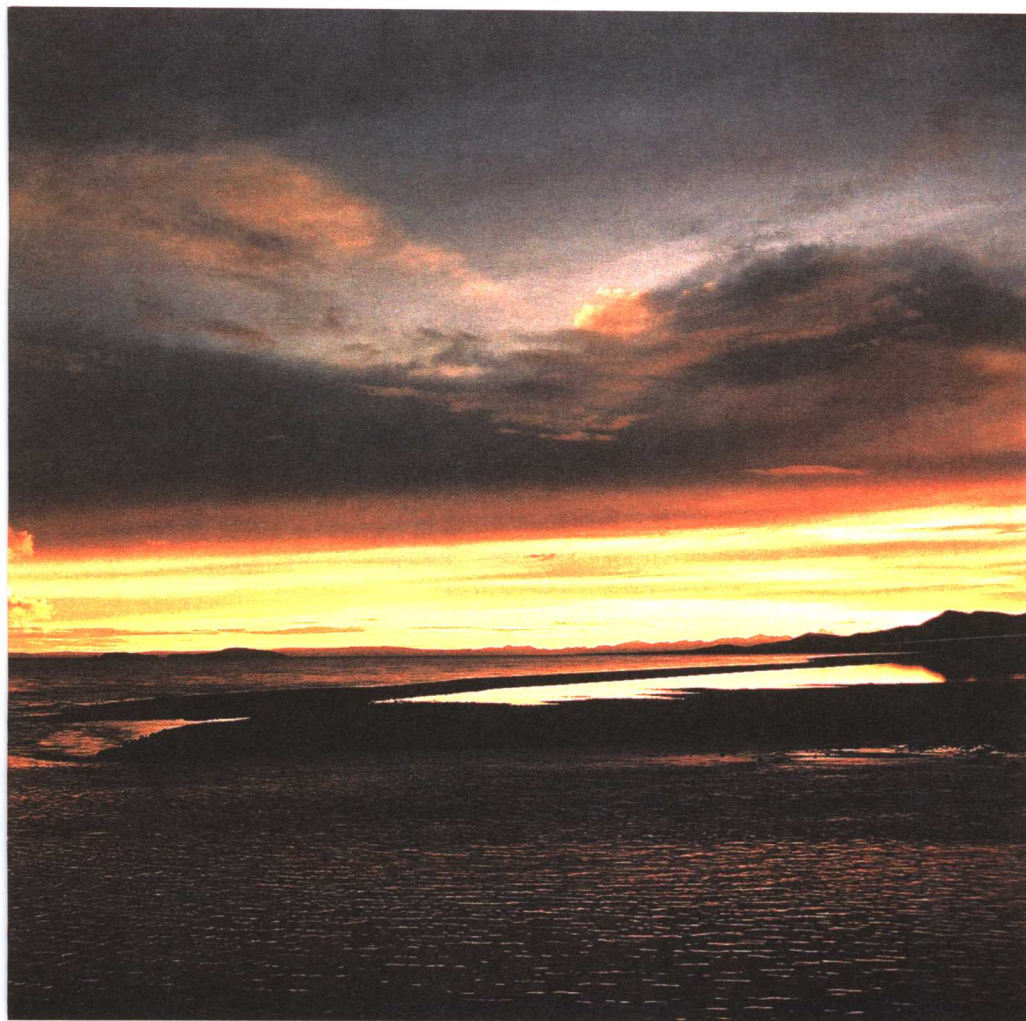
我的同学张忠，从西藏回来后，选择在成都工作，供职于一个图书馆，生活安逸而枯燥，令他痛苦万分。也就在1998年，忽接调令，转入《人民日报》，担任该报驻拉萨记者站站长。《人民日报》在拉萨有一个小院，里面有一栋气派的小楼，那是他的前任，也就是当年那位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刘伟的杰作。后来，《布达拉宫》剧组以《人民日报》的小院为大本营，一呆就是两年。由于不可抗拒的外力，《布达拉宫》的拍摄和制作，前前后后直到公映，延续时间长达五年。

因为做《布达拉宫》，我读了许多西藏的书，去了许多西藏的地方，也结识了许许多多的西藏人。这五年让我享受了很多欢乐的时光，也体味到许多郁闷难解的苦痛，甚至也陷入过极为悲伤的心境。经历了这番西藏之旅，感悟到的并不是人们常说的西藏的文化精神，而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2002年，我最后一次去西藏的时候，去了神圣的纳木错湖。面对着夕阳下闪光的湖水，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和西藏说再见了。我眼前群山



刘伟伟 摄



连绵，橙黄色的落日渐渐消失，天空布满灿烂晚霞，染红了湖水，真是一个壮烈的告别！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会有这么奇特的想法，如今每想到那个傍晚，心中无比感伤。

如今，李纓还在日本，留起了胡子，拍摄了很多电影，小有名气。子扬老兄当了很大的官，跟我们也多年不来往了。傅红星作为援疆干部，任职喀什三年；在喀什期间，曾护送黄茵去阿里，圆了黄茵的一个梦。黄茵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字编辑，不安于本职工作，后来写了大量的号称随笔的文字，爆得大名，拥有极多崇拜者；几年前，她辞去所有挣工资的工作，回家专心写作。现在许多旧友中，我和她走动多一些。

黄茵常说，她是因为西藏和我们结缘。俗语说，百年修得同船渡，意思是人与人之间的结缘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世界之大，芸芸众生，各人能去的地方和结识的人肯定是少数。但为什么人们总认为很容易和西藏结缘，并和在西藏认识的人以及因为西藏而认识的人结缘，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

黄茵嘱我为她这些关于西藏的文字和照片做序。知道黄茵去过西藏数次，极为热爱那个离她家乡非常遥远而又截然不同的地方，但对当年黄茵进藏的艰险，我也是读了她发来的电邮后方知。作为一个神秘的地方，西藏令人神往，它就像一个超脱世俗的神话。每一个走进这个神话的人，经历却个个不同；但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历经波折，经历一番生死的考验。

事实上，很多去过西藏的人，最先是被它奇异的风情所吸引；但风情最后也只不过变为沾满灰尘的工艺品，被挂在家里，或遗忘在不知名的角落里。我们对博大精深而又难解的西藏文化历史，所知极为有限。但每一个去过西藏的人，所经历的生命体验却可能是自己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经验。这或许是去过西藏并和西藏结缘的人最终能够相互结缘的一个原因。

以佛教义理中对“缘”的解释来说，缘只是事物生起、幻灭的辅助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西藏，而不是别的。机缘巧合，很多人去了西藏，认识了朋友，认识了

自己，也认识到了一种缘。但这种因缘巧合，带给你的可能是生活中的勇气、力量，甚至于激情。这样的解释离佛教的说法又远了很多很多。

（陈真：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东方时空·百姓故事》制片人、纪录片《布达拉宫》导演）

2006年2月2日，陈真携家眷在广州欢度春节。





1989，西行漫记

在 1989 年 8 月选择西行，有一个今天想起来得交待一下的原因：从 1981 年入行开始，我就成了一个无师自通的摄影发烧友，1989 年的 5 月到 6 月，我天天和广州各报社的摄记一道在街上晃荡，脖子上最多时挂着三台相机，为了拍摄街上潮水一般的学生和市民，我没少爬过垃圾筒、街树、石柱以及栏杆。后来，轰的一下，一切都静止了，到了 8 月，我们编辑部照例要把所有编辑打出去组稿和督促发行，大家自报地点。我心想，这时候，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到处亮相机呢？我猛地想起我有位女友就在战士报社当记者，我们走军线，去西北，应该没问题。再说，前年去开会我认识了拉萨体委的摄影记者焦卫平，抵步以后要搞辆车下去转转应该还行，于是就选择了去西藏。